

# 想象的民间

## ——论莫言《檀香刑》中的民间叙事

杜丽华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 莫言在《檀香刑》这一长篇小说中选取选取“民间”这一想象的空间展开叙事,体现了莫言从“他乡”到“家乡”的撤退,即自觉地放弃魔幻现实主义而转向本土化的民间叙事的过程。评论界对莫言的这种转向给予盛赞,认为莫言的书写是真真正正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在民间叙事的过程中,莫言极力还原自在自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作为叙事对象。而笔者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莫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民间写作虽然打破前人常规,但弊端流露出多种声音;其民间倾向性仍游离不定,算不得彻彻底底的民间立场。

**关键词:** 民间镜像;撤退;民间立场;不彻底性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2-0075-05

作家莫言在书写《檀香刑》这一文本时,叙述手法和描述方式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大逆转:对民间复调式声音的记录,对酷虐刑罚地暴力呈现,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跃然纸上,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将民间这一想象的空间展示在世人人面前。

### 一、想象的民间镜像

《檀香刑》讲述的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在这个民间故事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从威震一方的地方官员到仁人志士的后代,从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到不可一世的外国总督,从装疯卖傻的义和拳师到泥古不化的教书先生,从开狗肉店的“狗肉西施”到贫贱不移的乞丐,从屠宰场的看热闹的傻子到工于刑罚的刑名师爷,从乡野中唱“猫腔”的民间歌者到告老还乡的刽子手……性爱、暴力、仇恨、暗算,富有表现性和感知性的感知世界,摄人心魄的行刑场面,延宕曲折的故事推进,鲜活民间味浓郁的语言,造就了《檀香刑》这样一部“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神话。作品书写的是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激情,是未受文明世界规训而天真未泯、自由、感性而又合乎人性的生命“原始冲动”。莫言在《檀香刑》这一想象的民间故事中

着力歌颂了洋溢着强悍生命力的平民阶级具有的反抗意识,展现了在国破家亡、山河不在的时代语境中,民间原始生命力与居于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的死气沉沉截然不同的一面,这是民间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作家所处的“民间”作为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故事背景,对于作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即便是在版图上小小的邮票般的土地也饱含让作家写不尽的人情世故。“民间”这一想象的文化空间只要一经作家化实为虚,就可以激发作家的才华,创造出能引起读者审美愉悦和精神共振的文学世界。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类”无疑是个重要的存在,而他的艺术魅力来源于他对高密东北乡爱恨交织、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檀香刑》不论是内在逻辑,还是外在叙事形态上,都特别突出“民间”这一想象的空间。莫言曾经坦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sup>[1]167</sup>。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里的一切人和事是莫言全部文学想象的发源地,“民间”镜像的异彩纷呈是作家创作日臻成熟的表现。

选取“民间”作为想象的叙述对象并非莫言

最初的选择。莫言曾经在《檀香刑》后记中说道(虽然笔者一直坚信,文学评论家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都不要太相信作家蹦出来在读者或评论家面前做的辩驳,作家和评论家从事的完全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文艺工作):“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味,也就弃而不用……<sup>[2]34</sup>”。莫言放弃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返归生他养他给他无限文学想象的民间世界,将魔幻现实主义全部推倒重来,将“民间”这一想象的历史、文化空间自觉地纳入文学创作之中,《檀香刑》是莫言创作野心的全面爆发。陈思和在评论文章中提到莫言的《檀香刑》并不存在一个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到本土的民间选择的转换过程,自然也就不存在一个“撤退”的选择,而是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发掘和阐述经历了一个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地自觉的过程<sup>[3]237</sup>。这种显性的民间镜像犹如庞大的冰山漏出海平面的那一角,深藏海平面之下的是作家在构建民间想象时的价值判断和民间立场。

## 二、由“他乡”撤退回“故乡”

要厘清莫言的创作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晰学界对莫言其文其人的接受和阐释经历的过程。笔者整理发现,学界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认知从一开始便难以摆脱一种西方文学创作和文艺研究影响的焦虑。莫言研究至今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作为研究肇始的8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领域都笼罩着挥之不去的西方情节,学界和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也热衷于套用西方理论术语。对于莫言作品的解读从一开始便在西方理论的视角下展开。文学批评将莫言纳入“魔幻现实主义”的队伍之中,随着评论家对于莫言的再解读深入,学界又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对莫言的一种误读。文学作品的产生是一个作家将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深层次上来说不论是莫言本人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还是作家的创作心

理,他并未接受纯粹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理解和接受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魔幻现实主义”。因此,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读者大众,都要竭力规避“莫言的写作只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文学表达”这种看法。福克纳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确定为研究对象的年代,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年代”。随着莫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使莫言的写作风格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后果是无视莫言艺术最根本也是最具生命力的特征——对民间剝悍生命状态的讴歌和对民间文化的讴歌与深思,而这种独具生命力的特征直观表现为原始的本土化和民间性叙述,莫言的文学创作正是吸收民间文化的精华才得以充沛着淋漓尽致的大气象大精神。莫言在创作渐臻佳境的时期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的创作源泉,并一发不可收拾,在其后的创作中对民间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原本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化有了更为感性和自觉的认识,将全新的、他者的艺术元素融化为自我的生命本真。这种回归母体的写作,让莫言文学作品不再是中西糅合产生的宁馨儿,而是植根于本土的有中国镜像的文学书写。

让我们再绕回到受西方“影响的焦虑”这一问题上来,无论我们如何书写“中国气象”、“中国故事”,西方经典似乎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莫言似乎有意识地在避免历史上形成的一代代作家延袭各自前驱的局限,想要突破这种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与造成的误读,确立自觉的主体影响意识和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可能是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夙愿和创作追求。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作家的主题影响意识和自我认知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处于是“师法西方”还是“师法中国传统”的撕扯之中,“五四”一代的作家及其精神追随者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当时间拉开一定的距离我们回顾五四,就会发现这种迫不及待的摧枯拉朽尤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新时期,对西方文学经验的解读和消化吸收是开放变迁的中国做出的时代和历史的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下,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关系。我们新的文化语境中对外国文学不同程度的进行研究、借鉴,但这并不与本土作家确定自己的主体身份发生矛盾,莫言算是一位对“民间”创作方面成功地完成自我认知的一位作家。莫言曾深受西方文学熏陶并一度视西方文学大师为自己的文学启蒙者,从莫言的《檀香刑》之前的创作来看,他的创作灵感和精神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是原始的、野性的、剽悍的、透着神秘气息的“高密东北乡”,一是欧美、日本以及拉丁美洲等充满异域色彩的“他乡”。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讲,不同作家对另外一些作家的影响潜移默化,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学大师,莫言的内心也有着“影响的焦虑”,而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莫言,一个全新姿态面世的莫言,一个进退自如、找到自己主体位置抽身开辟新的“民间”天地并取得成功的莫言。我们可以把《檀香刑》看作是莫言在文学道路上对自己身份的准确定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这样公然宣称自己新的文学立场也是莫言突破性的举动。

这种突破体现在莫言对民间形态的开掘和娴熟运用,《檀香刑》记录的是“民间”声音,一种迥异于“阳春白雪”的“下里巴人”艺术形式,是对一种主要流传在“高密东北乡”一带登不了大雅之堂并且即将没落的地方戏“猫腔”的艺术阐释。在《檀香刑》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俯身观察民间镜像的莫言。莫言谦虚地说,小说《檀香刑》是他青年时代的一次创作的改写,这是一次兜兜转转后的回归<sup>[2]65</sup>。而现在看来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高层次的升华,不可否认的是整部小说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道德导向和价值指引。莫言的《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对于解读《檀香刑》及作家在此之后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在这篇文章中莫言对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区分:“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sup>[4]</sup>,“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指点江山式的态度,自以为作家作为精英分子是“人民的代言人”和“时代良心”,这实际上是一种狂妄自大、傲慢而不自知的想法;“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永远不会

狂妄地想充当“人民的艺术家”。莫言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以“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面世的作家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消解,对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学传统的疏离,这种个体采样式的书写凸显了被宏大叙事掩盖的包括个人诉求和人性在内的个体经验和民间记忆,小说中有这样一段:高密知县,胡须很长,日夜思念,孙家媚娘,他们两个,一对鸳鸯<sup>[2]387</sup>。莫言笔下的孙媚娘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存在,是一个既想遵守妇道又敢于挑战封建的三从四德、敢恨敢爱的刚烈女子。在父亲孙丙与钱知县公开斗胡须的时候,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到众多作证的乡绅前面,第一次看到钱丁就为他的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形象倾倒,特别是他充满男人魅力和性的诱惑的胡须,还有脑后粗大黝黑的油辮子。在以往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倾倒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贞洁烈妇、大家闺秀抑或良家妇女断断不可有的龌龊想法。

这种直白、露骨的民间爱情书写突破之前的文学书写传统,民间爱情完全没有道德、规范、法律的约束,挣脱一切阶级和文化、文明的捆绑,在简单的民谣中成为可歌可泣的风流轶事,这得益于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借鉴,比起作家早期的作品自是另一番天地。

### 三、对民间价值立场的选择与重构

王光东在《民间与启蒙》一文中把“民间”分为“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和“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次<sup>[5]173</sup>,“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处中间地位,联系前后两者并使之产生关系,有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才能使他们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在对“民间”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不可能客观地、叙述地、再现所有的自在自为的民间文化,或者呈现任何未经加工的原始民间镜像,而是主观地、表现地、修撰地对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感悟上保留自己相对独立、自由、不受外在规范制约的个性精神。这样的“民间”书写已然烙印知识分子思想印记,我们不得不反思何为真正的“民间”书写。

对于民间社会的书写和建构,莫言在《檀香刑》中似乎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形态,即以非民间叙事立场与民间叙事立场对照进行的对照型的民间叙事。这种对照型,也是冲突性的民间叙事立场在之前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就已经出现过。作家围绕一个官逼民反的案件反复用三种不同的叙事声音来进行:公告报告式的庙堂话语、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言说的民间话语。然而这种尝试并不成熟,长篇小说《檀香刑》将这种对照型的民间叙事发挥到了极致<sup>[3][39]</sup>。莫言在这个文本中使叙事者角色糅合了至少三种声音,几种声音如猫腔般各种音色哗然进行,让持价值判断立场的知识分子角色与民间角色产生交集,人物之间通过“对话”建立关系,进而使不同的人物社会观和价值观正面交锋并产生冲突。其中虽然不乏解构与消解,但因为加入了非民间的叙事立场,民间叙述使得民间力量摆脱客体性和被动性而具有了主体性和被表现性。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企图用众声喧哗作为叙述体,尝试引入通俗文学的说唱艺术作为叙述语言。在“凤头”、“貂尾”两部分,作家可以安排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刽子手赵甲成为庙堂的代言人,县官钱丁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叙事以及孙丙、孙眉娘和赵小甲所代表的民间叙事,共同地承担起一件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的传统故事,这种多话语角度的叙述正反映了作家想要表现的复杂的民间状态。

笔者发现在民间与庙堂之间,莫言有意在消解知识分子“高屋建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民间做代言人、阐述者的作用,尽量剥离知识者与民间的关系,将民间从知识分子的话语想象中抽离出来,表现一个更为纯粹的“民间”,这种“民间”需要知识分子这个中间代言人,充满主动性与主体化,与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述效果。在莫言看来,作家的工作与民间工匠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这样心态下的创作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莫言的创作也在小心翼翼地践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视角下的“民间写作”。我们应该承认的是,莫言在《檀香刑》中对于民间的书写涵盖方方面面,不论是作为表层的叙事语言,还是感知现象背后的感知世界,都能发现作家倾尽心血想要建构一个民间社会。

#### 四、莫言民间叙事立场的不彻底性

在莫言看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及批判立场忽略了一个真实、自在的民间。他不是批判五四启蒙忽视民间主体性的发起者,《檀香刑》想要表现的是一种生气和活力,一种“自在、自为”来自民间的张力。但我们深知民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乌托邦,它是一种视域、一种认知、一种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话语场。民间的社会形态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和“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次,民间形态的复杂性似乎在告诉人们神化、美化民间都是枉然。

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莫言对民间的书写和叙事立场存在不彻底性的痕迹。“究竟是谁的民间”?“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区分<sup>[4]</sup>,中国作家向来以精英自居,对庙堂崇拜向往并且潜藏精神贵族心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个有力的反拨。但是作家即便如何确认身份也摆脱不了知识分子这一公认角色,即使是自觉地俯身民间,也并不能完全逃离知识分子身份。批判作家以往的精神贵族心态,也并不要求作家全部撤回民间针对民间专门创作,否则,作家精神大撤退背后是创作只有民间形式却没有民间灵魂的文学,而没有灵魂的文学很难打动人心。《檀香刑》的创作初衷是创作一部真正能让普通老百姓接受的小说,而且莫言意识到了这本书在商业化、传媒化、市场化的今天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格格不入”指的是极力规避知识分子的精英叙事立场。莫言想要真真正正地书写最为“自在、纯粹的”民间,在民间这个驳杂陆离的世界里找寻到可以安放心灵的栖息地。然而,《檀香刑》一文很多细节体现了莫言在表现“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立场时的内心矛盾。在众声喧哗、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檀香刑》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大人物、大英雄的竟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乞丐。这位“英雄”直到全书快结束时才姗姗来迟,这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式的文学存在;而读者最渴望成为“一条龙”的孙丙却是一个“跳蚤式”的存在,他的世界只有“食,色”,没有责任心,也没有家庭

观念。莫言在刻画孙丙这一人物时表现出“捉襟见肘”式的窘态,整部作品中刻画得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高密县令钱丁。钱丁是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又是一个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的人物。钱丁的同胞弟弟是刺杀袁世凯未遂而身亡的烈士,他又收养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志士刘光第的后代刘扑。越是接近小说的结尾,钱丁越是显示出其作为士大夫一族对民间力量的主宰和把持。小说中钱丁的弟弟钱雄飞刺杀袁世凯的,并在刘光第慷慨就义后义无反顾的追随未完成的戊戌运动,总让人感到对于上层统治力量的描写与小说的整体格调与民间叙述发生疏离。这种不和谐的转向让人不得不深思:莫言在向民间世界“撤退”时并未彻底地消解他潜在的知识分子意识,这也是民间立场和民间叙事与潜在的知识分子意识的矛盾。吊诡的是,作家莫言在相当多的场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的知识分子意识,似乎是更真实的莫言。

莫言不止一次站在读者面前说,《檀香刑》实际上写的是“人类灵魂的幽暗面”。写人性的阴暗面和弱点,此时的他探索人性的丰富和复杂,这似乎是阐释《檀香刑》的一个论点,然而却未能在民间叙事的立场上展开。莫言似乎总是在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这两种身份之间游离不定,作一个挖掘人性、拷问灵魂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一个记

录悠游自在的民间艺人?这两种身份的莫言似乎在思想深处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斗,所以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压抑那不停地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意识,似乎从他一开始思考人性和叩问灵魂就丧失了自己的“民间立场”不难发现,克服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撕裂知识分子或温情或悲情的“文化英雄想象”,抛弃高踞于普罗大众之上的精神贵族心理,克服知识分子阶层的矫情,洞察民间社会的落后、愚昧、麻木不仁,也认识到民间的丰富和存在的合理性,是作家在构建想象的民间这一共同体时必须平衡处理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莫言在努力做一个“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作家”而时时却又出现与精英写作思想抗激烈斗争的窘态。

#### 参 考 文 献

- [1]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 [2] 莫言. 檀香刑[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 [3] 陈思和. 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M]//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4] 莫言.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J]. 当代作家评论,2002(1):4-9.
- [5] 王光东. 民间与启蒙[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An Imaginary Folk Space

——On the folk narrative in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DU Li-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In his novel *Sandalwood Death*, Mo Yan constructs a narrative in an imaginary folk space and thus returns back to the “homeland” from an “alien land”. During the course, Mo Yan consciously gives up magic realism to localize the folk narrative. Critics of Mo Yan give high praise to this transition for his creation of novels in the folk standpoint and his return to the in-and-for-itself and aesthetic folk nar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xtural reading and the diversified critical discourse, it is evident that though Mo Yan tri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 in his writing of folk style, there are still the ambiguities in the folk tendency and the unthoroughness in folk standpoint.

**Key words:**folk image; return; folk standpoint; unthoroughness

【编辑 王思齐】